

立足文本，关注现实——孙伯鍈先生学术思想的价值和启示

吕世荣 姚顺良

孙伯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他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文本，关注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充分展开与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对话，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富有启示意义的学术遗产。

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建以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实质上局限于“读经”、“注经”阶段。孙先生则认为“六经皆史”，强调必须以文本为依据，从历史的视角加以解读，取得了多项原创性学术成果。这里略举两例，以见一斑：

一是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历史解读，提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经历“两次转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逻辑”的观点。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和其他有关论文中，孙先生以详实的文本考证和深邃的历史分析指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经历了“两次转变”，即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思辨哲学影响下的唯心主义，转变到费尔巴哈和赫斯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再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连续性和间断性相统一的过程。苏联学者依据列宁的提法认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便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彻底转变的所谓“一次转变论”，否认1844年秋至1845年春马克思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夸大了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中的连续性；而阿尔都塞所谓的“认识论断裂”说，则夸大了这一过程的间断性。事实上，“两次转变”之间的青年马克思，并不仅仅处于人本主义的“问题系”之中。孙先生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即：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后一种逻辑早在《神圣家族》中就开始萌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区分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到了《评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几乎完全取代了前一种逻辑。这证明不存在截然对立的“两个马克思”，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个马克思，而是“一个马克思”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阶段”。

二是通过对经济学文本的哲学解读，深入开掘和系统阐发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方法论思想。孙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内在统一的整体，而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是马克思一生贯彻始终的最主要的理论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同这一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先生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校内教材中，依据《资本论》的通行版，对其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发。进入80年代以后，马克思大量经济学手稿的发表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陆续出版，促使他重新开始并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对马克思浩繁的经济学文本进行系统阅读。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进行哲学解读的丰硕成果，已经汇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奠基性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之中。孙先生是第二卷的主编之一，他与本文笔者之一合作，撰写了“《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方法论”部分，从哲学视角解读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时期和《资本论》创作的四个阶段；严格以文本为依据，深入开掘和系统阐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历史进程思想和关于人的学说；以及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创立过程、这一方法的基本内容和实质、新经济学方法论的普遍价值和哲学意义；在统稿过程中，还对马克思主义新自然观形成和《资本论》中的科技社会学思想等，通过改写和充实进一步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发掘。其中，关于历史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本身的历史性、三大社会形态与四种经济形态、人的本质与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异化和人道主义、马克思自由观的实质，以及科学的方法只能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新见解，马克思在创立新经济学方法论过程中对英国经验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批判和辩证综合，还有马克思主义新自然观的实质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等等，可以说都是孙先生独立或合作得出的新观点。

二
关注现实问题，是孙伯鍈先生学术研究中又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都同社会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紧密相关。这里仅指出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并从深层次上系统揭示了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大意义。如何认识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实质，如何从哲学高度理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意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孙先生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唯物主义路线的重新确立。对于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一般人仅认为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破除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迷信，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孙先生则认为远不止此。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但他的晚年事实上却背离了这一原则，究其原因是他没有从严格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去把握实践，而是赋予实践以一种他所特有的革命浪漫主义色调。马克思所阐明的实践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以“由需要和外在规定要做”并处在一定的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支配之下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和出发点；只要还没有达到“自由王国”的彼岸，实践就不可能变为纯粹“自由自觉的劳动”。马克思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发现了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第一次用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迷雾中的人类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毛泽东对实践和理论的关系

系问题是紧紧围绕着政治革命、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来进行研究的，这和马克思毕生把物质生产实践和与之相联系的客观经济规律作为研究和阐明的主题是不同的。马克思强调了人们的实践还处在“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之中，需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加以考察。毛泽东则强调极有可能在客观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对待实践。毛泽东后期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所强调的实践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更深刻的意义，是通过与实践问题的深入讨论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自觉的唯物主义路线上来。其二，贯彻基本路线的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左”、右的错误都是教条主义，只不过后者在形式上是颇为时髦的洋教条，其实大部分是几百年一贯的陈货。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不以任何教条、任何固定观念为根据的；它唯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就是力求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因此，要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不动摇。其三，要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层次上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性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告诫全党，在涉及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的选择上，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增长，而不应该纠缠于它们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争论。孙先生认为，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是仅仅根据目标来规定手段和方法，还是根据客观实际来选择手段和方法？孙先生认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实际手段的选择高于理想目标的确立。因为确立目标只是提出任务，选择手段才是实现任务。同时，目标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导向，而手段的选择则必须严格地依据于客观条件。而且手段和目标的区分具有相对性：合理的手段使短期目标不断实现，是向最终目标的迈进；手段的实现可以是短期目标，但相对于最终目标来讲仍是手段。因此，孙先生认为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避开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是主张在手段和根本目标之间适当地拉开距离，以便在选择手段和方法时多从实际出发，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方法，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用内在统一的辩证方法和历史方法指导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和方法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学界长盛不衰的热点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孙先生的基本思想是：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方法。作为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超越的。他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过程论证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恰恰是以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马克思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是方法论的革命，是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方法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他不是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上，而是将其推广应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马克思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也是方法论的革命，是把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这一改造的成果就是物质生产实践，正是从这一实践中马克思获得了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实现了自己哲学方法论的最终变革，即要求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作为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解决当代实践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是历史主义方法和辩证方法的内在统一。孙先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中的“历史”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时空范畴中的社会历史，而是把事实当做“过程”而非“实体”来理解的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科学”，主要是指把事物当做过程来研究和理解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也是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过程中，从其产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来加以研究。因此，辩证的观点同时就是历史的观点，反之亦然，即把事物当成一个“过程”来看待。孙先生认为，当我们不是从通常的角度来理解“历史”，而是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时，“历史”和“辩证”就达到了内在的统一，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一般原理和特殊应用的关系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及其理论；二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问题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历史现实。如何更好地从现实出发，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主义方法，即用发生学的观点看待现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不追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限度内具有历史合理性。他们的方法就是非辩证的，非历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是从“物”出发，是唯“物”的，但不是唯物主义。历史主义不是简单还原而是着眼于发生学的观点研究现实，不是线型思维方式而是开放的研究方式，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想路线。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也体现了彻底的辩证法。

三

充分展开与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对话，在碰撞和交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孙伯鏊先生学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第一，主张理性对话和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哲学社会思潮。

孙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不应无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从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和考订方面来说，某些西方学者确实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这些方面加以引进、介绍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哲学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现实关系和特定存在状况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必定这样那样地传递着时代的信息，我们能够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分析和理解把握当代西方社会的深层矛盾和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开展跟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的沟通与对话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孙先生在这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是方法论上的贡献。他主张运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西方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社会背景变化中进行研究，并从其哲学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中把握当代西方社会的深层矛盾和发展趋势。《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就是他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孙先生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为线索，分析了卢卡奇一生的思想演变和学术成就，展现了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学者生涯，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他的业绩，并分析了卢卡奇的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不回避争论和交锋，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纯洁性。孙先生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保持开放态度，积极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思潮对话，但他认为，这种对话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科学分析态度，而不是趋时媚众，用西方最时髦的流行哲学行话来改装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孙先生积极参与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他这一态度的最好证明。概括起来，他的思想主要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人道主义的区别是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哲学人道主义者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以纠正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所谓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孙先生明确指出，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之所以是唯心主义的，在于它从人的先验本质出发，以理想化的人的本质评判历史，构划了人与非人的矛盾。实际上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只能是价值玄设，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强调只有研究每个人特殊的社会存在方式，才能揭示他们的本质。其二，孙先生具体探讨了马克思怎样从抽象的人本主义观点转变到现实人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这一转变，较之其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更困难也更有决定意义，并具体探讨了这次转变的两个决定性环节：第一个环节是马克思认识到研究人类历史不应该从抽象的一般人性出发，而应该从特殊的个人出发。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所谓“一般人权”的虚伪性。到《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理性而是“利益”。第二个环节是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突破的。在此时的几部著作和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研究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拟定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新的出发点。最后，孙先生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这一命题的错误在于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它的主要倾向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总之，不管是重视对文本的解读，还是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以及倡导与西方思潮的对话，其主旨都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使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或许，这就是孙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

参考文献

孙伯鍈，1985年：《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4年：《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载《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

1996年：《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载《天津社会科学》第6期。

2001年：《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载《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

孙伯鍈主编，2001年：《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

庄福临、孙伯鍈主编，199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二卷（八卷本），北京出版社。

（作者单位：吕世荣，河南大学哲学系；姚顺良，解放军理工大学社科教育部）

责任编辑：李登贵（《哲学研究》2004年第3期）